

宋金

山西地域建筑营造

朱向东 赵青 王崇恩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自序

山西省因在太行之西而得名，又因春秋时期大部分地区为晋国所有而简称“晋”，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因而又别称“三晋”。山西东依太行山与河北接壤，北以古长城与内蒙古为界，西、南隔黄河与陕西、河南相望，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称之为“表里山河”。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调查，山西“共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300余处。……西侯度、匭河、丁村、许家窑、峙峪、下川等一系列重要遗址的发现与研究，成为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山西境内的古建筑遗存众多，宋辽金时期以前的建筑遗构数量居全国之首，且具有极高的科学研究价值。2010年，太原理工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晋地宋（辽）金时期建筑营造技术地域特征研究”（项目批准号：51078251）。几年来，项目组成员竭尽全力，赴全省各地进行调研，通过踏勘、测绘等手段，搜集整理了大量宋辽金时期始建或重建的木构建筑遗存本体信息和周边自然、人文环境信息资料，同时还认真查阅了相关文献和研究资料，建立了集宋辽金时期山西地区建筑遗存本体、周边历史环境、相关文献及研究成果等“三位一体”的建筑营造技术图文信息数字档案，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图书一部^②。项目组主要成员还指导硕士研究生完成相关学位论文近二十篇，取得了一定

^①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2012年发布的《山西省考古工作六十年》。

^②朱向东,赵青,王崇恩.宋金山西民间祭祀建筑.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12.

的科研成果。

针对山西地区宋辽金建筑的营造技术构成及特点，项目组成员就建筑的选址、布局、空间、结构、构造、艺术等诸方面进行了多角度分析，从开始关注行政区划的研讨，到中期注重河流流域的影响，再到后期的综合分析，对山西地区早期木构建筑遗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有了一定的认识，培养和提高了我省地方建筑史学研究团队及成员的科学素养。

本书即是在项目团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山西地区河流流域和历史文化等自然、人文条件对宋金建筑营造技术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和梳理，编撰完成的又一本研究文集。在项目研究的起步阶段，我们将山西省按照行政区划和地理特点划分为晋北、晋中、晋南和晋东南四个区域，分别对各区域的建筑遗构进行踏勘测绘、资料收集和文献研究。在逐步深入研究的过程中，项目组发现，我们所研究的早期建筑遗存（包括所有古老的居民点、甚至是古文化遗址等），其选址和规划布局都与历史上的河流有关；其建筑材料，如木材、石材等，也与河流流域内的树木植被、山体岩石等密切相关；我们还发现，其建筑的建造技艺在各自的流域内也很相似，有许多共通性。因此，我们逐渐认识到，流域作为一个河流水系，其贯通的整个区域，与行政区划的地域相比，它的区域概念更趋自然，区域范围所指更加宽泛。因此，对山西各流域早期木构建筑的分片研究，不仅能够深入了解该区域内古建筑技术的营造特征，而且对探索技术特征的源流也有很大的帮助。基于上述原因，项目组将原定按照“地区影响”展开的研究框架调整为按“流域影响”进行研究。

经过对山西河流的梳理，项目组将省内的五大河流汾河、沁河、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河等流域，作为课题研究的重点区域。前两条河流是黄河的支流，后三条河流属于海河支流。除汾河流域之外，其他如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等流域均与周边相邻省份所共同拥有，存在区域文化的共通性。另外，项目组也发现，流域和行政区域也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如汾河，主要流经晋中和晋南；桑干河位于晋北的塞外；滹沱河在晋北的五台山地区环绕；而漳河、沁河都被称作是晋东南地区的“母亲河”。

本书依据上述流域的划分，将研究内容分为七个章节：第一、二章的内容均涉及汾河流域宋金建筑营造技术的研究。第一章主要建立研究框架，第二章着重进行



实例分析；第三、四、五、六章的内容分别是沁河、桑干河、滹沱河和漳河流域宋辽金建筑营造技术的研究；第七章考虑到漳河、沁河两条河流均属于历史上的同一个区域——晋东南地区，因此安排了漳、沁两河流域宋金建筑营造技术研究的内容。另外，这样安排也是因为该地区宋金建筑遗存的数量为全省最多，占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质量很好，也很有地域特色，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本书的编撰和出版，旨在发掘整理宋辽金时期山西地区建筑遗存信息，并对其价值，包括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同时，作为国家基金项目的后续成果，我们也希望通过该书的出版，将山西省境内这些优秀的早期建筑文化遗存向社会大众作一定的展示和介绍，为建筑遗产的保护尽我们的一份力量。

在项目的研究和本书的编撰过程中，编著人员均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由于经验不足，精力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不免有欠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和同行给予批评指正。

引言

一、山西政区的历史发展概况

行政区划是一个国家为了进行分级管理而实行的国家土地及其行政管辖权力的划分。一般说来,行政区划是以在不同区域内,为全面实现地方国家机构能顺利实现各种职能而建立的不同级别政权机构作为标志。我国的行政区划,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主要以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市(自治州、区)、县(自治县、街道)等三级编制单位来划分的。山西,即是我国划分的众多省份之一,其位于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自古被称为“表里山河”。山西现辖太原、大同、朔州、阳泉、长治、晋城、忻州、吕梁、晋中、临汾、运城等11个地级市,共计119个县级行政区。总面积为15.6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3300万。

山西大部分地区在春秋时期(前770—前476年)为周的诸侯国晋国所辖,因此简称“晋”。春秋末期(前403年),晋国被韩、赵、魏瓜分,史称“三晋”。其后,“三晋”遂成为山西的别称。另外,由于山西在地理上西临黄河,东依太行,又有“河东”、“山右”之别称。

早在上古时期,就有人类在山西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目前,在山西省境以内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已有100余处^①,如芮城县西侯度遗址、匭河遗址等。夏、商、周时期,山西西南部一直是“中央集权”的所在地,如传说中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等;山西散布着许多商朝统治下的大小不等的方国,如商朝的土方(今大同、忻州北部)、亶方(垣曲)等;西周分封诸侯,山西南部主要为晋国所据。由于晋国的强大,土地不断扩充,山西被晋国所占据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山西分属韩、赵、魏三国。秦、汉时期,山西相对比较安定;三国时期,山西主要为曹魏统

^①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54.

治,桑干河以北为拓跋鲜卑族占有。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为北魏所统一,政治地位也随之提升。公元385年,拓跋鲜卑族在盛乐(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建都,建立代国;386年改国号“魏”,史称“北魏”。398年,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428年,统一山西全境;439年,统一北方。隋唐时期,全国统一,山西相对比较安定,直至五代十国。

宋辽金时期,北方契丹族政权辽国占据山西北部的大同、朔州等地,与北宋对峙;而后,北方又一少数民族——女真族政权金国先后灭辽和北宋,山西全境归金朝据有。

(一) 辽

辽,契丹所建。公元907年,契丹八部之一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以后又陆续兼并邻近的室韦、奚、沙陀、吐谷浑(当时居今山西北部)、党项等部,击败回鹘、女真、黠戛斯等族,又东灭渤海,到公元916年,阿保机称帝,国号为契丹。公元947年改称辽,公元983年复称契丹,公元1066年又改称辽。从公元916年建国到公元1125年被金所灭,历时210年。

辽盛时疆域:东至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北抵胘胸河(今蒙古国及中国内蒙古境内的克鲁伦河),南以白沟与宋分界。

辽仿唐制,地方行政区划为道、府(州)、县三级建制。设京府五: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今北京城西南,又称燕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大明城遗址)。以五京为中心,设立五道:上京道、东京道、南京道、西京道、中京道。据《辽史·地理志》记载,“晋高祖代唐,以契丹有援立功,割山前、代北地为赂,大同来属,因建西京。”今山西北部时属西京道所领。

西京道下辖大同府(统二州、九县,在山西境内有大同、怀仁等七县)、蔚州(山西境内有灵丘、广灵二县)、应州(山西境内有浑源等三县)、朔州(山西境内有马邑等四县)^①。

(二) 北宋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检校太尉、归德节度使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陈桥镇)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北宋,改元建隆,仍都东京开封府,以洛阳为西京河南府,宋州(河南商丘市南)为南京应天府,大名府谓之北京。自公元960年建立到公元1127年被金所灭,北宋历时167年。

^①张纪仲.山西历史政区地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5:5.

赵匡胤即位后,经过长期攻伐,先后灭掉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太宗继位后,又降平海、吴越,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灭北汉(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南)时,中国除东北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回鹘,西南的吐蕃、大理外,其余各地皆统一于北宋中央政府,基本上结束了唐中叶以来的方镇割据局面。

北宋的地方行政区划迭有变更,总的来说,宋初承袭唐代后期之制,地方实行道、州、县三级建制。宋太宗时改道为路,实行路、州、县三级建制,终宋一代不变。

1.道、路

唐代后期,凡置节度使、观察使的道,都是军事区兼行政区。遇朝廷临时派遣黜陟使等实行监察,道又成为监察区。在唐代制书中,有时把“道”也称为“路”。

北宋初期,基本仿照唐制,全国分为13道,即河南道、关西道、河北道、河东道、淮南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陇右道、山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东道、剑南西道、岭南道。太平兴国四年(979年)设21路,三年后改为19路,端拱二年(989年)改为17路,淳化三年(992年)改为16路。可见,在淳化五年以前的15年中,宋太宗一直实行“道”、“路”并存的行政区划制。淳化四年(993年)又并为10道。淳化五年后,全国设路也未有定规。在至道三年(997年)改道为路,后又有所调整,始定天下为15路:京西路、京东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福建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广南东路、广南西路、西川路、峡西路。崇宁四年(1105年),宋徽宗将国都开封府置为京畿路,合称为24路。宣和四年(1122年),宋徽宗与金联盟,约定灭辽后,金将燕云16州归还宋朝,因而宋拟置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但金灭辽后失约,所以北宋末年号称拥有26路,但实际管辖还是24路。

2.州、府、军、监

路以下一级,为州、府、军、监,直属朝廷。各州长官,实行军制,由朝廷委派京朝官管理州郡事,称“权知某州军州事”,表示全权管理一州军、民之政,带有浓厚的军事性质。州、府、军、监为同级行政单位,不辖县的军、监等于县。比一般府重要的府为京府。府设尹或少尹。如无人任尹,则设“权知某府事”一员。军的长官为节度使,但无军权,实际上还是行政区。

3.县

宋制,州府以下统县,以及相当于县一级的军监和尉司。宋分县为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八等,除赤、畿为四京属县所定等级外,其余都按户数多寡而定。县的长官,宋初称“判县事”,后改为“知县”或“县令”。其职权在于主管一县的民政、司法、财

政,县驻有军队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

另外,宋在边地也设羁縻州府。

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北宋徽宗时,全国共有26路、4京府、30府、254州、63监、1234县。今山西境内,主要为河东路,永兴路的一部分也在今山西境内。河东路共统3府、14州、8军、82县(其中3州、3县不在今山西境内);永兴军路共辖2府、15州、1军、83县,在今山西境内者有1府、1州、13县。北部大同、朔州等地由于在五代时被割让给了辽国,辽国设西京于大同,宋朝一直未能收复。

(三)金

公元1115年(宋徽宗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世居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酋长完颜阿骨打叛辽称帝,改国号为金,定都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市区南2公里白城)。以后又经过十年的对辽战争,于公元1125年灭辽,于是,辽的五京诸路,尽为所有。两年后(1127年)又灭北宋。接着连年对南宋用兵,至公元1141年“绍兴和议”,已经东至淮水,据有中原大部土地。“绍兴和议”后,金主完颜亮由会宁迁都燕京,此后金的南侵和南宋韩侂胄的北伐,均未改变“绍兴和议”后形成的南北对峙的局面。公元1234年,金被蒙古所灭。从立国到灭亡,共119年。

金袭辽制,仍建五京:以会宁府为上京,临潢府为北京,辽阳府为南京(后更名为东京),大定府为中京(后改为北京),大同府为西京。以后又改燕京为中都大兴府、汴京为南京开封府。实际上金的都城,初为会宁,后迁汴京。

金代的地方行政区划,袭辽、宋旧制,大致为路、州(府)、县三级。熙宗皇统二年(1142年),宋金议和初成,金国土分为17路,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为20路,章宗泰和五年(1205年)为19路(罢临潢府路并入北京路)。

据《大金国志》、《金史·地理志》记载,泰和五年(1205年)前后,金代的19路和治所分别为:

路 名	治所及今地望
中都路	大兴府(今北京市)
上京路	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南)
东京路	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
北京路	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西)
西京路	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市)
咸平路	咸平府(今辽宁开原市北)

河北东路	河间府(今河北河间市)
河北西路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
山东东路	益都府(今山东益都县)
山东西路	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县)
大名府路	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东)
河东北路	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
河东南路	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市)
京兆府路	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
凤翔路	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县)
鄜延路	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市)
庆原路	庆阳府(今甘肃庆阳市)
临洮路	临洮府(今甘肃临洮县)

由上述各路和治所可知,金代在山西北部置西京路,中北部置河东北路,南部置河东南路。西京路下辖大同府和应、蔚二州;河东北路下辖太原府和晋、忻、管、汾、石、代、隰、宁化、岢岚、保德十州;河东南路辖平阳、河中二府和隰、吉、绛、解、泽、潞、辽、沁八州。

二、山西的地形地貌与河流分布

(一)山西地形地貌

山西因地处太行山以西,故名。古代山西在西周和春秋时,因其大部地区属晋国领地,故简称“晋”,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又因韩、赵、魏三家分晋,故又有“三晋”之别称。

1.地理位置

山西省位于我国北方阴山山脉与秦岭之间,华北大平原西侧,西北黄土高原东翼,地跨黄河中游与海河两大水系流域。东及东南部以太行山脉与河北、河南两省为界,西及西南部以吕梁山脉和黄河干流与陕西、河南两省相邻,北部以外长城与内蒙古自治区接壤。省境平面轮廓近似于平行四边形。地理坐标为北纬 $34^{\circ} 34' \sim 40^{\circ} 43'$ 、东经 $110^{\circ} 14' \sim 114^{\circ} 33'$ 。东西宽约290公里,南北长约550公里,全省总面积15.63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6%。

2.地势地貌

山西省境内地形地貌呈多元型,复杂多变。省境四周几乎完全被高山大河所环绕,境内山丘连绵,峰峦重叠,地势高峻起伏,沟壑纵横交错,山地、丘陵、高垣、盆地等地貌

形态均有分布,大部分地区海拔均在1000米以上,自古有“表里河山”之喻。

根据地形特点可将山西省大体划分为东部山地区、西部高原区、中部盆地平川区三大部分。总的地势是:东西两侧为山地和丘陵隆起带,中部为一系列串珠式盆地沉陷,平原分布其间。根据山西省水资源信息管理平台所显示的数据,各种地貌类型占全省总面积的比例大致为:山地约占72%,高原约占11.5%,盆地约占16.5%。

(1)东部山地区

本区以太行山为主干,自北向南主要山脉有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行山、太岳山和中条山,海拔大都在1500米以上,其间穿插分布有广灵、灵丘、阳泉、寿阳、长治、晋城、垣曲等多处山间小盆地。恒山为五岳之北岳,起于管涔山,向东北延伸至河北境内,长约200千米,主峰海拔2016米,为大同与忻定盆地之界山;五台山因由五个平台状山峰组成而得名,为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主峰北台叶斗峰为华北最高峰,海拔3058米;系舟山位于忻定盆地之南侧,海拔1800米~2000米;太行山系为山西同河北、河南两省分界之山岭,长达400余千米,海拔在1500米以上,其东侧为大断层,高出华北平原1500米~2000米,地势陡峻险要,西边山西一侧地势较为平缓,逐渐过渡为低山、丘陵地带;太岳山又名霍山,平行排列于太行山以西,主峰霍山海拔2346米;中条山北接太岳山余脉,向南延至黄河北岸,最高峰在垣曲县境内的舜王坪,海拔2322米。发源于本区的河流,除丹河、沁河出省境后注入黄河外,其他河流均由西向东汇入海河水系。

(2)西部高原区

本区以黄河北干流为界与陕北黄土高原相连,东部以吕梁山脉为主干有一系列高山峰岭突起于省境中部断陷盆地中,自北向西有黑驼山、管涔山、芦芽山、云中山等,最高峰关帝山海拔2830米。吕梁山以西通称“晋西高原”,属堆积侵蚀地貌,由北向南可分为梁状黄土丘陵区、梁峁状黄土沟壑区和残垣沟壑区三部分,地表普遍覆盖有10米~15米厚的黄土,局部地段厚达60米~80米,经长久的水流冲蚀切割,可谓千沟万壑,地形十分破碎。

(3)中部盆地区

本区自东北向西南纵贯全省,依次由大同、忻定、太原(晋中)、临汾、运城5个雁行式平行排列的地堑断陷盆地组成。海拔自北向南呈阶梯下降,大同盆地为1050米,太原盆地为750米,运城盆地为400米。盆地面积以大同盆地的6080平方千米为最大,忻定盆地的2751平方千米为最小。盆地内地势平坦,水土资源丰富,是山西省工农业经济发达之地。

特定的地质构造所形成的山西特有的地形地貌特征,控制了山西河流水系的发育,从而构成山西河流之特点:大部分河流均呈辐射状向省境四周发散流出,且大多属山溪型中小河流,源短流急,季节性强,夏季多发暴雨山洪,径流时空分布极不均衡。

(二)河流分布

水是生命的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必需条件。远古的人们为求得最基本的生存环境,起初一般是逐水草而居,即选择靠近河、泉、湖泊居住,但往往受到洪水泛滥之害,因此又“择丘陵而处之”(《南淮子·齐俗训》),以躲避洪水灾害。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由于受到水流自身运动现象与自然地貌形态的启示,终于发现“土能挡水,水来土拦”这个极为普通的道理,于是开始由被动的躲避洪水变为主动地抵御洪水,从而开创了古代原始形态的治水活动。这种原始的治水活动,无非是修筑一些简而又简的土石堤埂,把居住区和耕地用土围子保护起来,阻止洪水的漫延与淹没^①。河流是人类的亲密朋友。古埃及文明孕育于尼罗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开端于恒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渊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而中华文明则发祥于黄河流域。即使在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化、信息化社会以后,多数人口和多数大都市仍然选择依托河流栖息、发展。

山西境内河流众多,受地形地势和自然气候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山地型和下雨型河流特征。即大多河流发源于东西两翼山区,上游源区河道多穿行于深山峡谷之中,河床纵坡陡,水流湍急,冲刷力较强,河流长度一般只有几十千米,河长超过100千米的河流屈指可数。由于流域纵深小,降水与径流大多同丰同枯,夏季(6、7、8三个月)降水量高度集中,局部暴雨洪水时有发生,从而形成境内多数河流的季节性特征。夏秋两季河道中水量充沛,冬春枯水季节河道清,水量很小甚至断流干涸,只有少数河流因有泉水补给而长年清水流淌。

山西省境内河流分属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属黄河流域者主要位于省境西部,属海河流域者主要位于省境东部。其中,属黄河流域的面积为97138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62.2%;属海河流域的面积为59133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37.8%。

除流经省界西面和南面的黄河干流外,山西境内流域面积大于10000平方千米的大河有5条,分别是:属于黄河流域的汾河、沁河,属于海河流域的桑干河、滹沱河与漳河(在山西境内分清漳河、浊漳河两河)。另外,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千米小于10000

^①张荷.晋水春秋——山西水利史略述.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4.

平方千米的中等河流有48条,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千米小于1000平方千米的较小河流(包括较大洪水沟峪)共计397条。

汾河是山西省内最大的河流,亦是黄河第二大支流,自北向南纵贯省境中部,其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24%;沁河是黄河三门峡至花园口间三大支流之一,源于山西沁源县境,于河南武陟县境注入黄河,流域面积的72%在山西境内;桑干河是永定河上游的主要支流,上源为恢河,在朔州市境内与源子河汇流后始称桑干河,于阳高县境出山西进入河北阳原县境,在官厅水库上游与洋河汇流后始称永定河;滹沱河是子牙河上游的主要支流,源于山西繁峙县境,至孟县境出山西入河北省平山县,在河北献县境与滏阳河汇流后始称子牙河;漳河是海河水系漳卫南运河上游的主要支流,在山西境内分为清漳河与浊漳河两条河流,浊漳河则分浊漳南源、浊漳北源、浊漳西源三支。清漳河与浊漳河在河北省涉县境内合漳村汇流之后始称漳河。

三、山西宋辽金时期的社会、宗教背景

山西北部是宋辽对峙的西路前沿。而在形成宋辽对峙之前,盘踞太原及忻州等地的北汉是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为宋所灭的北方政权。

(一)山西宋辽金时期的社会背景

唐代末期,战争频发,诸侯割据,史称“五代十国”。这一时期,山西再次成为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等王朝的立足之地。尤其北汉,是“十国”时唯一一个都城、疆土都在山西的王朝,同时也是“十国”中唯一的北方之国。公元951年,后汉王刘知远弟、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刘崇于太原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所有者,并、汾、忻、代、岚、宪、隆、蔚、沁、辽、麟、石十二州之地”^①,且“地狭产薄,又岁输契丹,故国日用削”^②,国力有限。然而,由于北汉与北部契丹结盟,依附于辽,北汉的都城又沿用了唐代北都(后称“北京”)^③晋阳城,易守难攻,故无论是后周时期的周世宗柴荣,还是北宋初年的宋太祖赵匡胤等,多次讨伐北汉均未成功。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再次起兵征讨北汉,终获成功。在这次征战中,汇聚山西建筑之精华的唐代北都晋阳城被彻底毁灭。

^①参见《资治通鉴》卷二九〇《后周纪一》,太祖广顺元年正月戊寅,中华书局1956年版。

^②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

^③晋阳是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夺取天下的发祥之地,李唐王朝不断对太原进行扩建,规模宏伟的晋阳城成为唐朝的北方屏障。公元690年,唐朝定太原为北都。公元742年,改太原为北京,与首都长安及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南府)合称五京,晋阳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1. 晋阳城的毁灭

公元前497年,晋国公卿赵简子的家臣董安于在今太原西南的悬瓮山东麓、汾河西岸据险筑城,因城池建在晋水之阳,故名晋阳。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分晋,晋国解体,晋阳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赵国的都城,山西始有“三晋”之称。公元前201年,汉高祖刘邦为防御匈奴,选派韩王信坐镇北方,改太原郡为韩国,设都城于晋阳,晋阳从此成为我国北方边防重镇之一。公元550年,东魏权臣高欢之子高洋夺取东魏政权,自立为齐皇帝,历史上称北齐,都城在邺。因晋阳是北齐创业的基地,北齐历代皇帝几乎每年都来往于晋阳、邺城之间,晋阳被称作“别都”。由于高欢、高洋及后来北齐的历代帝王对晋阳的刻意经营,晋阳实际成为北魏与北齐的政治中心。公元617年,李渊父子从晋阳起兵,攻入长安。次年李渊自立为帝,定都长安。唐太宗李世民青年时期,曾随父李渊居住晋阳,人称“太原公子”。由于晋阳是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夺取天下的发祥之地,李唐王朝不断对太原进行扩建,规模宏伟的晋阳城成为唐朝的北方屏障。公元690年,唐朝定太原为北都。公元742年,改太原为北京,与首都长安及南京(成都府)、西京(凤翔府)、东京(河南府)合称五京,晋阳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后唐、后晋、后汉,以及北汉等都在晋阳起事称帝,晋阳因此被认为是出“真龙天子”的地方。

公元979年,北宋平灭北汉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以太原为军事重镇、屡有拥兵起事而割据一方称王称帝者,认为太原有“龙脉”。太宗为防后患,下令将太原降为一般的州,移治榆次(今山西晋中市榆次区),又令在汾河以东修筑新城,将晋阳居民迁出居住。随后,又下令焚烧晋阳城,“城中有老弱不及避者,多死于大火”^①。宋太祖赵匡胤攻打太原时曾水淹晋阳,太宗亦堵汾水、晋水灌城,加之焚烧,于是水火之后,晋阳城化为一片废墟。至此,历时千载的古城巨筑化为灰烬,城内建筑也随之付之一炬。

再说新建的太原城,为了防止再次出现“真龙天子”,北宋统治者在筑城时采取了种种“意识形态”上的措施,如将城中纵横相交的街道布置成“丁”字形,取“钉”的谐音,意欲“钉死龙脉”,等等。金代诗人元好问在其《过晋阳故城书事》中写道:“……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几时却到承平了,重看官家筑晋阳。”

2. 宋辽金时期山西地区的社会经济

北宋初年,山西战事频繁,加之政府大规模移民并限制回流耕种,造成并州地区(即今山西中北部)人口稀少,土地荒芜。“始,潘美镇河东,患寇钞,令民悉内徙,而空塞

^①降大任.山西史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60.

下不耕,于是忻、代、宁化、火山之北多废壤”^①。这给山西地区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庆历五年(1045年),欧阳修在出使河东后上言:“河东之患,在尽禁缘边之地,不许人耕,而私籴北界粟麦,以为边储。”^②意思是说,由于河东境内废地甚广,粮食产量连宋朝的边防军备都无法满足,还要从“北界”(辽国境内)购买^③。

由于山西北接契丹、西临西夏,是北宋的边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数十年后又逐渐得到朝廷的重视。宋嘉祐四年(1059年),宋廷又恢复了太原河东节度使旧称;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改太原为次州;大观初年(1107年),又升太原为大都督府。山西地区逐渐得到朝廷的重视,人口大幅度增长,农业和手工业,尤其是煤炭业、冶炼业、陶瓷业、纺织业以及盐业等,得到较好的发展,经济状况也逐步得到好转^④。城市和建筑方面,太原宋城的发展、晋祠的扩建等,营造技术都达到北宋时期较高的水平。

宋辽金时期,山西北部桑干河流域等地为辽契丹族占据。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在大同建西京,以巩固其西路边境。早在唐代中期,契丹部落即出现小范围农耕地,辽与宋接壤的山西大同地区,农业得到进一步重视,而传统的畜牧业、煤铁采炼等也同时得到发展。城市建设方面,西京大同的发展较为突出,《辽史·地理志》载:“敌楼栅橧具,广袤二十里。门:东曰迎春,南曰朝阳,西曰定西,北曰拱极。”

公元1115年,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统一女真诸部后,于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建都立国,国号大金。女真族(隋唐时称靺鞨)崛起之后,先是与宋联手攻辽,并于公元1125年灭辽;后又南下攻宋,于公元1127年亡北宋,遂与南宋对峙。至此,山西地区完全为金人占领。金朝女真族入主中原,初期以暴力掠夺方式站住脚跟,对山西等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在统治巩固之后,逐步接受了汉族文化,实行适应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的政策,社会经济有所好转。特别是在金熙宗时期,“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在金史上有“小尧舜”的美称^⑤。

(二) 山西宋辽金时期的宗教信仰

宋辽金时期,山西与其他地区一样,佛教、道教都很兴盛,偏远山区的民间信仰也很发达。

1. 北宋时期山西中南部的宗教发展

①参见《宋史》卷三一二《韩琦传》。

②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四,庆历五年二月。

③安介生,《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379。

④刘泽民等,《山西通史·卷四·宋辽金元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60-80。

⑤降大任,《山西史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88-189。

后周时期,周世宗曾实行灭佛政策。但在山西中部,北汉政权对佛教还是大力弘扬的。北汉睿宗时,五台山真容院僧人继颢广纳布施,兴建了真容院四面廊庑及华严寺楼阁,还塑造了山龕罗汉32堂,每逢三八普施温汤,设四众无遮粥会700余人。天会五年(961年)诏授继颢为“五台山十寺都监,赐师号广演匡圣大师、鸿胪卿,参与国政”^①。继颢善商财利,他购买契丹马数百匹,献与睿宗。他还利用五台山矿藏资源,“于团柏谷置银冶,募民凿山,取矿煎银,官收十四,国用多于此取给,即其地建宝兴军”^②。英武帝继位后以功授继颢为“大汉国都僧统检校”“太师兼中书令”,开了政教合一的先河,时人称为“山中宰相”^③。

北宋建立后,为了悬系民心,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都大力提倡佛教,这使得中原地区的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山西中南部地区的佛教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仍以五台山为例,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历朝历代都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北宋建立以后,宋太宗曾诏曰“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免税赋”,着力扶持五台山佛教。据宋代妙济大师所撰《广清凉传》载,宋时,五台山拥有寺庙73座,仅次于唐^④。从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眷想灵峰,流光五顶,天书玉札,凡三百八十轴,恢龙佛化,照耀林藪,清凉之兴于时为盛”^⑤。

与佛教的发展一样,道教在北宋也得到了诸帝支持,“太宗、真宗、徽宗皆崇尚道教。太宗曾征得道书7000余卷,命人校正;真宗封泰山、祭后土,是属于道教崇拜的重典。……徽宗自称道君皇帝,诏求修撰道书,编《道史》,颁布御注《道德经》……河东路因之道教盛行,道观广建,如泽州、晋州之玉皇顶、玉皇庙、东岳庙,遗迹犹存,尤以泽州玉皇庙著名”^⑥。

2. 辽朝时期山西北部的宗教发展

契丹民族传统的信仰是原始巫教(也称萨满教),开始接受佛教则是在唐代末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逐步统一契丹诸部的过程中,接触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群,吸收先进文化的结果。会同元年(93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攻入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及山西北

①参见《十国春秋》卷一百五《北汉二·睿宗本纪》。

②参见《十国春秋》卷一百五《北汉三·定王继颢》。

③范堆相.忻州地区宗教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11.

④范堆相.忻州地区宗教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12.

⑤参见镇澄《清凉山志》卷四。

⑥降大任.山西史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173-174.

部),这一带本就是汉族佛教发达地区,此种环境对契丹族佛教的兴盛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①。

辽朝时期,山西北部大同、应州等地虽与五台山佛教圣地隔绝,但因受辽政权的支持,佛教的发展势头也很强盛。据《辽史·地理志》记载,“清宁八年(1062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清乾隆《大同府志》也记载,应州“佛宫寺在州西北,初名‘宝宫’,辽清宁二年,田和尚奉敕建。有木塔,道宗赐额曰‘释迦’,高三百六十尺,围半之,六层八角,上下胥巨木为之,玲珑宏敞称宇,内浮屠第一”;天镇县“慈云寺,在城西街,旧名法华禅寺,唐时建,辽开泰八年修”等等。说明辽代在山西北部新建和重修佛教寺院的力度还是很大的。

道教在辽朝虽不及萨满教和佛教的地位高,但也有一席之地。辽初,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三年(918年)“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②;四年八月,“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寺观”^③。又如辽时流传于山西北部地区的右玉道情(道情本系道教徒为传教而编的道歌),深得辽朝上层的喜爱。

3. 金代山西的宗教发展

金占领北方地区以后,对宗教采取了保护政策,尤其是佛、道二教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其中,佛教在山西地区依然兴盛。金初,金源“内地”有佛教信徒,太宗天会元年有上京庆元寺僧献佛骨之事。世宗时期,社会安定,各地兴建和修缮的佛教寺院的数量居金朝各代之冠^④。

如五台山,仍是北方地区四面八方前来进香朝拜的佛教圣地。金海陵王完颜亮正隆三年(1158年)于五台山北麓繁峙县天延村建造灵岩寺并由御前承应画匠王逵同画人王道于正殿中绘制了水陆图壁画。金世宗完颜雍以儒治国,对佛教利用与限制并重。因其母贞懿皇后李氏出家为尼,大定三年(1163年)敕建五台山万岁寺、平章寺,重建了净明寺^⑤。明万历《大同府志》中,注明为金朝兴建和重修的大同地区的佛教寺院有二十余座,如大同善化寺、山阴瑞云寺、应州净土寺等;又据临汾佛教史料集载,金朝兴建和重修的佛寺有近五十座。

① 牟钟鉴等.中国宗教通史(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89.

② 宋德金等.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58.

③ 同上。

④ 宋德金等.中国风俗通史(辽金西夏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383-384.

⑤ 同上。

受辽宋的影响,道教在金代也有较好的发展。陕西咸阳人王嘉(重阳子)创建了全真道,使道教得到发展。另外,王重阳还推崇“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创立全真教时,王重阳极力倡导三教合一,并以道教的《道德经》、儒家的《孝经》、佛教的《心经》为道教全真教派的必修经典。在他所写的诗中有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山西地区,金代兴建的庙宇或殿堂中,有许多是信奉“三教合一”的,如陵川寺润三教堂、泽州李寨三教堂等。

由此可知,山西在宋辽金时期,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是非常兴盛的,创建或重新修缮的佛寺、道观以及其他祠庙建筑的数量也是非常多的。许多宋辽金寺观祠庙建筑被历代所维护,保存至今。

四、山西宋辽金建筑遗存及分布

宋辽金时期,公元10世纪中叶至13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终止了唐代末年五代十国的格局局面,建立北宋王朝,定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后被金人攻破,王室南迁,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又立南宋王朝。与此同时,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则分别在中国北方先后建立了辽、西夏和金政权。在这南北相持的三百年间,虽然战争频繁,但在战争间隙也有相对稳定的时期,而就这一时期,宋代在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顶峰,正如历史学家陈寅恪所说:“华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少数民族统治的地区虽不及宋,但“因俗而治”的政策也使北方地区的科技发展成绩斐然。

山西地区先后作为辽与北宋对峙和金政权据有的区域,在各个方面也有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建筑方面,或承前朝“唐风”,或袭当代“宋制”,或靠地方工匠的探索,营造技艺也有着很高的水平。如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年)的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北宋天圣年间(1023—1032年)的太原晋祠圣母殿以及金大定八年(1168年)的晋祠献殿,等等,这些建筑造型优美、技艺精湛,在全国也是不可多得的建筑精品。

据山西省古建筑专家柴泽俊先生在其所著《山西古建筑文化综述》中统计,山西现存宋辽金时期的建筑遗构约有120余座。其中,宋代建筑40余座,辽代建筑近10座,金代建筑70座。这些建筑散布在全省各个地区,绝大部分集中在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汾河和沁河这五大流域。各流域山西段宋辽金建筑遗存的分布情况统计如下。

1. 桑干河流域辽金建筑遗存

山西境内的桑干河流域是中国历史上北部少数民族通向汉民族的咽喉,其特殊的